

从中日两国近代化的不同看甲午战争的结局

○ 刘悦斌

(中共中央党校 文史部,北京 100091)

[摘要]中日两国在大体相同的背景下开始近代化,但具体做法上却有很大不同:日本积极主动,中国消极被动;日本明治维新是国策,有坚强有力的近代化建设领导核心,中国洋务运动不是国策,没有坚强有力的近代化建设领导核心;日本非常重视普及国民教育,而中国仍然坚持以精英教育、应试教育为主的科举教育;日本的近代化基本上是器物、制度、文化心理三个层次齐头并进,中国的近代化则是三个层次分为界限分明的三个阶段。这些不同做法背后的原因,除政治、经济结构和国际环境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文化传统因素。

[关键词]中国;日本;近代化;文化传统

关于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日本胜利的原因,学术界已经作了很多探讨,有军事方面的(国防战略和战场战术、武器装备等),有制度方面的(制度落后,与当下的反腐相呼应,近来不少人强调并重点分析了当时官场腐败的因素),也有思想观念(“中体西用”等)和文化力方面的(国民意识、战争观念、海洋观念、科技意识等)。本文则试图从中日两国近代化的不同做法及其背后的原因作一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

我们知道,中日两国是在大体相同的背景下开始近代化的:(1)当时两国都是落后国家,经济技术状况大体相同,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没有近代工商业,军事力量弱,综合国力小。(2)都自视甚高,都把自己的文明程度看得远远高出

作者简介:刘悦斌,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历史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其他国家,充满虚骄之气,如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以给乾隆帝祝寿的名义来华,提出派遣使节驻北京、增开通商口岸等一系列要求,乾隆帝一口回绝,他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敕谕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馀润。……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1]日本统治者也有与此相同的思想观念:“以我天下之富,土地之广,不需仰赖外夷之物即可自足。”“神州(指日本)是日出和元气肇始的地方。天日的后裔,历代君临,万古不易。真是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纪纲。”^[2]因而都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限制与外国(主要是西方国家)的交往:清政府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制度,对来中国的外国商人作了很多限制性规定,而日本只保留与中国、荷兰在长崎有限的贸易和与朝鲜、琉球的往来,不与其他国家打交道。(3)都是被侵略国家,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42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美国、法国也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分别与之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舰队到达日本,以武力相威胁,要求日本开放通商,次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不平等的《日美亲善条约》,此后又相继与英、荷、俄、法签订了不平等条约。(4)都是在西方侵略下被迫对外开放。(5)都是为了自强御侮而开始近代化建设。

但是在大体相同的背景下开始的近代化行程,两国却有很多不同之处。举其要者,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日本及时抓住了机遇,近代化的启动积极主动,而中国则没有及时抓住机遇,近代化的启动消极被动。

日本在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之后,马上就开始了比较大规模的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活动。按理说,中国遭受西方国家打击比日本早,大规模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活动也应该比日本早,其实不然。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整整延误了20年,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受到了更严重的打击,才有一部分人认识到中西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再也不是“天朝上国”,西方也不是不开化的落后的“戎蛮夷狄”,而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3]他们把这一变化叫做“变局”或“创局”。^[4]在这种“变局”面前,一些开明官僚主张“借法自强”(李鸿章语),中国才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开启了近代化实践的大门。

以《海国图志》为例。魏源编撰《海国图志》,目的是在我们泱泱大国的中国被“蕞尔岛夷”的英国打败之后检讨我们失败的原因,为国人特别是统治者提供“知彼”的材料,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达到抵御外来侵略的目的,用魏源的话说:“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5]然而,让魏源失望的是,除了寥寥无几的几个志趣相投的有识之士外,《海国图志》并没有在统治集团中和社会上产生什么影响,当时整个中国犹如一潭死水,《海国图志》的刊行犹如小小的一粒石子投入这潭死水,波澜不兴。清统治者和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懵然无知,把英国的侵略看作是历史上曾经多次发

生过的化外之“夷”的又一次犯上作乱,《南京条约》一经签订,便意味着天下从此太平,并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中国的真正意义,有记载说:“议和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6]

然而,魏源这部在同胞中知音寥寥的苦心孤诣之作,却在日本花香四溢。《海国图志》最早是1851年由中国的商船带入日本的,传入日本后,很快受到日本有识之士的重视和欢迎,一时间,《海国图志》的翻刻本(按原文翻印)、训点本(在汉文上下旁边加上训读符号或假名)与和解本(日文译本)纷纷刊印。据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的研究,仅仅在1854年至1856年的3年间,日本刊印的《海国图志》各种选本就有20多种,^[7]由此可见日本人对了解外部世界的主动与渴望。日本人高度评价《海国图志》,说:“夫地理既详,夷情既悉,器备既足,可以守则守焉,可以战则战焉,可以款则款焉,左之右之,惟其所资。名为地志,其实经武大典,岂琐琐柳书之比。”^[8]因而纷纷争读,作摘要,写心得,座谈体会,不亦乐乎,出现了一个《海国图志》热。

《海国图志》对日本人打开眼界、了解世界资本主义起了重大的作用。正如一个日本学者指出的:“本书译于幕末海警告急之时,最为有用之举。其于世界地理茫无所知的幕末人士,此功实不可没也。”^[9]《海国图志》是日本明治维新前最重要的启蒙读物之一,它使日本人知道了外部世界是个什么样子,给他们中的维新志士以启迪,使许多保守人士转变了思想,从而推动了日本的开国与维新。据日本学者统计,明治维新的代表人物全都读过《海国图志》,以致有日本学者说:“《海国图志》起了决定日本前进道路的指南针作用。”^[10]

对于《海国图志》在中国国内受到的冷落,连日本人都看不过去,感叹道:“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所用,而反被琛于他邦。吾不独为默深(魏源,字默深)悲矣,而并为清帝悲之。”^[11]读史至此,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感慨系之!

其二,明治维新是日本的国策,有坚强有力的具有近代化建设知识的领导核心;洋务运动不是清政府的国策,后来的戊戌变法和预备立宪虽然成为国策,但是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日本近代化的大规模进行是在明治维新时期。明治之前统治日本的是德川幕府,天皇有名无实,一批中下级武士出身的改革派联合与德川幕府有矛盾的西南诸强藩,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发动倒幕战争,打败了幕府军队,迫使幕府将军还政天皇。天皇取得政权后,迅速于1868年4月发布“五条誓文”,提出“破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的口号,在大久保利通等一批维新志士的辅佐下,开始实行了一系列近代化建设的政策和措施,即“明治维新”:首先建立起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和领导下,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有计划分步骤地大力兴办“殖产兴业”(工业化)、“富国强兵”(建立近代常备军)、“文明开化”(近代化教育和西方生活方式等)的各项活动。明治天皇及其他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如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都是有见

识、有能力的领导者。

反观中国,近代化运动一直缺乏一个既有近代化建设知识、又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洋务运动是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部分开明官僚倡导、主持进行的,他们各自根据自己的认识水平和权限举办洋务活动,除李鸿章外,他们也都是在自己任职的地区举办洋务活动,因此是各自为战,缺乏系统性。清中央政府中虽然有恭亲王的支持,但是实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她但知权力,缺乏远见,缺乏近代化知识,没有进行近代化建设的全盘规划和统筹安排,她所做的就是批准或者否决洋务派官僚的洋务举措。也就是说,洋务运动不是清政府的国策。之后的戊戌变法和预备立宪虽然成了国策,但是都缺乏既有见识又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戊戌变法时的领导者康有为、光绪帝有见识但没能力,慈禧太后有能力但没见识;预备立宪时的领导者慈禧太后有能力没见识,接她班的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则是既没见识又没能力。

其三,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特别重视普及国民教育,而我国的教育改革十分迟缓,仍主要是精英教育。

日本明治政府充分认识到,“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增进一般民众的知识。”^[12]于是,采取各种措施发展和普及国民教育。1871年,成立文部省作为主管全国教育的机关,把制定全国统一的学制作为首要任务,于1872年8月出台《学制令》等文件,批判了幕府的旧式封建主义教育,提倡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提出“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国民皆学”的平等教育政策。^[13]教育内容则侧重于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知识,如小学的修身课,以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为基础,同时包括日本精神和儒家道德思想;历史课除日本史之外,还有中国史和西洋史;地理课则讲授日本和世界五大洲的地理及人种知识等。^[14]之后日本政府对教育体制逐渐完善,到1890年代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近代教育体系。

日本政府不惜一切努力来提高儿童的就学率,日本的一般国民也认识到国民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许多有钱人捐赠巨款帮助政府兴办学校,知识分子也纷纷创办私立学校以培养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福泽谕吉在东京创办的庆应义塾。由于政府和民间的努力,国民教育迅速普及,到1907年,学龄儿童就学率已经达到97.38%。^[15]上世纪60年代,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吉田茂自豪地说:“直到今天,人们到乡村旅行时,仍然可以看到,小学校的校舍大多是村中最好的建筑,表明日本人对教育的尊重。”对高等教育,或由政府高薪聘请外国教师,或派遣日本学生留学外国,大力培养高级学者。吉田茂说:“为了实现近代化而如此重视教育事业,这是日本近代化的一大特点。”^[16]

我国在教育方面则迟迟没有进行根本的变革。从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确立,我国的教育可以说就一直是应试教育,尽管受教育的方式可以不同,有官学(中央有国子监,既是掌管全国学校的最高行政机构,又是全国最高学府,又称“太学”;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还有众多的书院和私塾,但都是精英教育,读书士子的目标只有一个: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换句话说,就是培养政府官员。

发展到清代,科举考试已经僵化,内容上,只以《四书》《五经》为根据,考生只能“代圣贤立言”,不允许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形式上,主要是八股文和试贴诗,特别注重小楷。这种教育制度自然培养不出近代化的人才。洋务派在举办洋务活动的过程中,深感人才缺乏,曾试图改革科举制度。李鸿章等人建议清政府“变通”科举考试,“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17]在科举考试中增加“算术格致”、“机器制作”、“外国情事利弊,语言文字”等内容,^[18]但是清政府没有接受,另一洋务派重臣沈葆楨奏请废除已经没有什么用处的武科,更被清廷指责为“实属不知大体”,传旨申斥。^[19]洋务派只得另辟蹊径,建立新式学校和派遣留学生,但是这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落后的教育制度,不能大量培养符合洋务活动需要的人才,当然更不能全面培养具有近代化知识和思想的国民。一直到1905年,清政府才废除科举制度,开始按照近代学校的教育体制和内容进行国民教育,远远落在了日本的后面。

在派遣留学方面,一方面,日本派出的留学生比中国多,仅1870-1872年间,就派出752名,^[20]而中国1872年才开始派留学生出国学习,这就是留美幼童,此后4年间总共才派出120名,1877年开始派遣福州船政学堂学生留学欧洲,到1886年共派出70多人,二者相加不到200人。另一方面,日本的留学生是全面学习西方各种学科,而清政府派出的留美幼童从小学开始,虽未明确规定学习内容,但清政府选派幼童留美的初衷是学习西方的“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因其“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21]而且到1881年全部撤回,除詹天佑等二人外,其余都没有完成学业,至于留学欧洲的船政学堂学生,则限于学习轮船制造和驾驶。甲午战争后,梁启超引述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话说:“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行之。强弱之源,其在此乎!”发出“不幸而言中”的慨叹。^[22]虽然这里讲的“游欧洲者”主要是指中日两国派赴西方国家的使节,但对留学生同样适用。

其四,日本的近代化基本上三个层面齐头并进,特别是及时进行了政治改革,实行了君主立宪;而中国则是分成明显的三个阶段,政治制度缺乏实质性的变革。

根据现代化理论,现代化分三个层面:器物(物质,经济)、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文化心理(人的现代化),层层递进和深入。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因为现代化(近代化)不是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是在外力压迫下进行的,因此这三个层面齐头并进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日本,器物、制度、文化心理三个层面的近代化大体上是同时进行的,制度层面略微落后一些。日本在进行物质的近代化建设的同时,对民众的思想启蒙工作也开始进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福泽谕吉,这期间他写了很多著作,向日本国民宣传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主要有《文明论概略》和《劝学篇》。在《文明论概略》中,他提出“先难后易”的近代化建设路径,认为“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

文明难求,谋求一国的文明,应该先攻其难而后求其易。”^[23]具体程序是:“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24]即沿着文化心理→制度→器物的顺序进行。19世纪70年代,日本掀起轰轰烈烈的自由民权运动,提出开设国会、制定宪法等政治主张,并出现了若干民间版本的宪法草案(所谓《私拟宪法》),促使明治政府进行政治改革。1880年3月,自由民权派组织国会期成同盟,向政府递交了《开设国会请愿书》。同一年,日本全国各地要求开设国会的请愿签名人数达24.6万余人,递交的请愿书、建议书达70件。日本政府尽管对自由民权运动进行了镇压,但也不得不顺应民意,进行政治制度改革。

1875年,日本天皇颁布立宪政体诏书,明治政府朝着立宪政体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以后主张采仿德国宪政体制的伊藤博文逐渐掌握了制宪权,1885年10月他提出全面改革政府机构,用内阁制代替原来的太政官制,伊藤出任日本第一任首相。1889年,颁布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了第一届帝国议会,君主立宪制度正式确立。但是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与德国的还是有很大不同,与英国的差别更大,主要体现在天皇的权力过大,天皇不但神圣不可侵犯,并且拥有统帅军队、对外宣战媾和等大权。日本的广大人民虽然还享受不到比较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但毕竟确立了君主立宪形式的资产阶级国家体制,使统治者在施政时不得不经一定的法律程序,较“朕即国家”的绝对专制制度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而在中国,这三个层面分成了界限明显的三个阶段:洋务运动是器物层面,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制度层面,新文化运动是文化心理层面。洋务运动虽然也有观念的更新,但是主要限于少数洋务知识分子和洋务派官僚,没有形成社会思潮,不是思想启蒙(或称思想解放)运动,它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是从属于“中学”、为“中学”服务的,换句话说,就是在不变动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机器生产等来强国。中国近代化初期,人们普遍没有认识到中国制度上的落后,李鸿章有句话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统治集团开明官僚的认识水平:“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25]到1980年代才有人认识到政治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戊戌变法把政治改革提上了日程,目标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由于威胁到慈禧太后的权力,被血腥镇压。20世纪初的立宪运动也是向着君主立宪的方向前进,但是同样没搞成,直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政治制度才实现了革命性的飞跃,但是在实际上,袁世凯及其后的北洋军阀统治,还是专制独裁的,这才引发了新文化运动,近代化发展到文化心理层面。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三个层面的近代化都没有完成。

二

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之所以有上述不同,学术界已经从两国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国际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进行了不少分析,笔者以为文化传统(或

者说民族心理)的不同更为重要,从这方面分析也更有意义,因为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国际环境是客观的、被动的,而民族心理是能动的,因此在这里予以申说。

不同文化传统塑造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日本自古以来就善于学习、汲取外国的优秀文化,形成了学习、汲取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人们心理上易于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在这方面没有心理障碍。最著名的是在中国的隋唐时期,这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日本先后4次派“遣隋使”、19次派“遣唐使”来华,使团人数多时达五六百人,并有“留学生”、“留学僧”随行。他们广泛学习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文化艺术、儒学、佛学、医学、天文历法、建筑工艺技术以及风俗习惯(文字,服饰,茶道……)等,并付出不懈努力,历经五次失败,终于在第六次行动中将这时已经双目失明的扬州大明寺和尚鉴真迎到日本,传授佛经和大唐文化。

地理大发现后,随着荷兰等西方国家势力的东来,到18世纪初,日本又形成了以通过荷兰人这一途径学习西方先进事物为主要内容的“兰学”,包括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医学等,虽然受到德川幕府的压制,势力无法与儒学相比,但却再次证明了日本有学习外来事物的文化传统,也为日本进入近代后迅速大规模向西方学习奠定了基础。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和佩里舰队的到来,使日本人充分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因而迅速转向,向西方学习。在这方面,日本人没有心理负担,不但开明的领导人很积极,一般老百姓也没有抵抗,而是采取了“欣然引进西方文明的态度”。^[26]

吉田茂在给1967年版《大英百科全书》撰写的卷首论文基础上润色而成的《激荡的百年史》中举例说明当时日本人学习、模仿西方事物的情形时写道:

有一段讽刺当时情况的文章,这样写道:“文明开化”这句话,最近一个时期已经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了。可是真正知道“文明开化”这一译语的真意而谈论的人却不见得有多少。常听人说,“说是吃了猪肉就文明了。”“那位先生这些时候一直打着洋伞走路,真是太文明了。”“穿着鞋就进屋子,这可真是文明得让人受不了。”根本不了解原意,只是胡乱地把一些耳闻目睹的新鲜事物看作是“文明开化”,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差错。

人们对所谓“舶来品”争相抢购。有人主张对日本文字进行改革,还有人像森有礼那样,提出废除汉字,使用罗马字母的建议。甚至有人提倡改善日本人的体质,说什么“日本人虽天资聪慧,但缺乏毅力,此皆由于不食肉食所致。”因此,如果从幼儿时期即哺以牛奶,以后再让他吃牛肉长大,那么日本人也将成为富有毅力的国民。……甚至有人提倡同外国女人结婚以改良人种。

吉田茂概括说:“明治时期的日本,就是这样想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一下子加以改变。这里不可避免地要附带产生一些弊病,但毫无疑问,它会使日本更容易

引进西方文明。……唯有这种主动汲取外国文明的精神才是日本人的传统性格。”^[27]可谓是对日本文化传统的精辟总结。

中国方面，一般认为，中国历史悠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严重阻碍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步伐。笼统说，这样说是可以的，但是应该做具体分析。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并不保守，非但不保守，而是非常开放。东汉佛教的传入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中国化的佛教。特别是唐代，一方面热情欢迎外国人前来取经学习，一方面敞开胸怀尽情吸纳外国文化，甚至有不少外国人在政府任职，如唐玄宗时的秘书监阿部仲麻吕（汉名晁衡）是日本人，右武卫员外将军哥舒翰是突厥人，河西节度使高仙芝是高丽人，唐宣宗时的翰林学士李彦升是大食（阿拉伯）人。美国著名汉学家谢弗著有《唐代的外来文明》，详细介绍了唐朝时期中国引进的域外文明，共 18 类 170 余种。中国真正变的保守是到了清代，确切说，是我们常常称颂的康雍乾盛世时期。清朝以少数民族建立起全国统治，为了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清统治者致力于证明自己也是华夏的一部分，因而努力学习汉族文化，迅速汉化。雍正帝在曾静案中一反文字狱对当事人及其家属、门生大加诛戮的惯常做法，不但没有杀掉曾静，反而与他展开了一场“君”“臣”辩论，批驳曾静“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论点，强调儒家“君臣之伦”的天经地义，无非是为了说明清政权已经是华夏的一部分。雍正帝死后，其子乾隆帝违反父命，收缴并彻底销毁《大义觉迷录》，诛杀曾静，则更棋高一着，意味着清政权当然已经是华夏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根本不必讨论。在这种背景下，清统治集团表现出比华夏更华夏的姿态，于是走向保守一路，流风所及，使得朝野上下对中华文明沾沾自喜，盲目自大，自诩为天朝上国，视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是不开化的戎蛮夷狄，对外来事物深闭固拒，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保守的朝代。1724 年初，雍正帝下令严禁天主教，基本切断了中西之间的文化交往。1757 年，乾隆帝更宣布将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限制在广州一口，实行闭关政策，明末清初来华的欧洲传教士传来的西方地理、科技等知识很快被中国人忘掉，以至于到鸦片战争都快要结束的 1842 年 5 月，道光帝连英国的地理位置还不知道，问大臣说：“英吉利到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与俄罗斯是否接壤？”^[28]进入近代后，守旧分子反对向西方学习的最主要口号是“严夷夏之大防”，即只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用夷变夏”就是“卖国”，主张向西方学习就是“汉奸”、“卖国贼”。他们反对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时，就认为此举是“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因而“振振有词”地指责洋务派，说这样做的结果是“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29]不幸的是，这时的中国恰恰赶上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正值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和对外侵略扩张的时代，于是中国就悲剧了。这是中华民族的宿命，当然更是惨痛的教训。

三

但是,日本在近代化道路上领先于中国,并不必然导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军国主义的兴起。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笔者以为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之处:

第一,历史上,日本有向亚洲大陆扩张的传统,最晚在 16 世纪末,日本就开始了向亚洲大陆的侵略,当时的军事首领丰臣秀吉就提出了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并在 1592、1596 年两次出兵朝鲜,均告失败。丰臣秀吉之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一直绵延不绝,到明治维新时期,随着日本近代化的进行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对外侵略扩张的主张日益猖獗,甚嚣尘上。被称为明治维新的先驱思想家的吉田松阴就明确鼓吹“在交易上失之于美俄者,应以朝鲜和满洲求得补偿”^[30]的战略,福泽谕吉又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明确说:“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31]福泽谕吉的这一主张影响极大。有日本学者指出,战后福泽谕吉在日本“受到特别称赞,被誉为民主主义先驱,其肖像还被印刷在面额为 1 万日元的纸币上”,其实他“大肆鼓吹征韩和征清”,“他恰恰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言人”,^[32]可谓还了福泽谕吉的真面目。

第二,受当时国际关系现实状况的影响,日本接受了西方列强“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的强盗逻辑和丛林法则。1872 年,日本政府曾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大久保利通为副使的使节团,赴欧美 12 个国家进行考察,德国宰相俾斯麦对他们的一番话,极大地影响了日本人的观念。日本使团向俾斯麦请教德国富强之道时,俾斯麦说:“方今世界各国,虽皆声称以亲睦礼仪相交往,然此全系表面文章,实乃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谓公法,虽号称保全列国权利之典章,然而一旦大国争夺利益之时,若与己有利,则依据公法,毫不变动;若与己不利,则翻然诉诸武力,固无常规也。小国孜孜省顾条文与公理,不敢越雷池一步,以期尽力保全自主之权,然遭其簸弄凌侮之政略,则每每几乎不能自立。是以(普鲁士德国)慷慨激奋,一度振兴国力,欲成为以国与国对等之权实施外交之国。乃振奋爱国心,积数十载,遂至近年始达成所望。”^[33]俾斯麦的这番话使日本使节团茅塞顿开,特别是大久保利通对此欣赏、佩服之至,他回国后成为了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提出“用俾斯麦的强权,缔造英国式的富强”的日本近代化手段和目标。^[34]

第三,则是日本近代化的顺利进行和领先于中国和朝鲜。

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兴起的来龙去脉,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研究,此处略而不论。

反思历史,在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同时,我们也应认真分析研究日本在 19 世纪后期崛起为东亚强国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的实际,取彼之长,补我之

短,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注释:

- [1]《乾隆帝致英国国王敕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第1435卷。
- [2]分别见山鹿素行《山鹿语类》、会泽正志斋《新论》,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第13页。
- [3]李鸿章:《筹议海防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6册,安徽出版集团、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60页。
- [4]关于时人对变局的论述,可参见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应变之自觉》一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 [5]魏源:《海国图志·议战》。
- [6]无名氏:《软尘私议》,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下集),中华书局,1965年,第838页。
- [7]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第29页。
- [8][11]盐谷宕阴:《〈翻刻海国图志〉序》,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第37、45页。
- [9]杉木达:《海国图志·美理哥国总记和解跋》,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第37-38页。
- [10]大谷敏夫、胡修之:《〈海国图志〉对“幕末”日本的影响》,《福建论坛》1985年第6期。
- [12][16][26][27]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孔凡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10、11、12、12-13页。
- [13][15][20]吴廷璆主编:《日本近代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26、428、425页。
- [14]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98-99页。
- [17]李鸿章:《筹议海防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3页。
- [18]《李鸿章附呈藩司丁日昌条说》,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中华书局,2008年,第2265页。
- [19]蔡少卿等整理:《薛福成日记》上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184页。
- [21]曾国藩、李鸿章:《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折》,见陈学恂、田正平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91-93页。
- [22]梁启超:《变法通议》,李华兴、吴嘉勳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页。
- [23][24]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2、14页。
- [25]李鸿章:《致总理衙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安徽出版集团、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13页。
- [28]《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第370卷。
- [29]《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洋务运动》(二),第30-31页。
- [30]转引自蒋立峰、汤重南编:《日本军国主义论》上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
- [31]福泽谕吉:《脱亚论》,林思云译,http://bbs.tianya.cn/post-666-31448-1.shtml,2014年5月28日登录。
- [32]星夜芳郎:《追溯日本军国主义的源流》,张悦亭译,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年,前言。
- [33]久米邦武编:《美欧回览实记》,转引自《强国之鉴》,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7页。
- [34]转引自姚传德:《李鸿章与大久保利通的近代化思想比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